

滕莽集

胡从经著

中国现代文学管窥录



584
櫟 莽 集

——中国现代文学管窥录

胡从经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8.75印张 8插页 43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80534-072-2

I·67 定价：4.40元



作者 像

目 次

1 蕊珠如火一时开

——试论鲁迅杂文的渊源及与
中国现代杂文运动的关系

37 鲁迅与中国新诗运动

66 “弄潮儿”赞

——鲁迅创作论断想

76 爱国主义——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主旋律

87 一片冰心在于菟

——鲁迅早期的儿童文学活动

98 开拓新地的破土犁痕

——鲁迅与儿童文学漫笔

114 不懈的追索者

——柔石文学轨迹初揆

156 叶紫论

197 报春紫燕 破晓曙星

——蒋光慈倡导革命文学功绩述评

224 拓荒者的耒痕与耒迹

——洪灵菲及其创作

247 《孩儿塔》蠡测

——殷夫前期诗作浅探

280 东平小论

301 在民族解放战争圣火中羽化的凤凰

——天虚创作鸟瞰

329 彭家煌论

350 为了大众的需要而努力

——李伟森与文学“副业”

367 冯铿——第一个为理想与事业献身的

中国现代女作家

391 光明探求者的心路历程

——读郁达夫日记

400 为觉悟的工农塑像的最早丹青手

——刘一梦烈士及其小说创作

408 在黑浪中展翅翱翔的海燕

——左联烈士冯宪章及其诗作

419 被黑暗所吞噬的天才作家——罗黑芷

428 顾仲起的悲剧

436 潘漠华的小说创作

441 不应被遗忘的左翼文化战士——韩起

446 搏击罡风迎曙日
——革命诗人征军和他的诗

453 朱墨点染新天地
——柏山在左翼十年中的小说创作

459 南中国的“喇叭手”
——“中国诗歌会”主干温流及其诗作

468 一颗早陨的晨星
——胡洛及其业绩

473 铁律的丰碑 血铸的铭篆
——“左联”反文化“围剿”斗争的辉煌战绩

506 中国革命儿童文学发展述略（1921—1937）

518 叶紫年谱

593 跋

蕊珠如火一时开

——试论鲁迅杂文的渊源及与 中国现代杂文运动的关系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异的文学现象，充分认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整个历史进程中所起与将起的影响和促力，还有待于时日；但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还没有任何个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产生过如此浩大的威力与魅力，则是肯定的。鲁迅杂文作为鲁迅学中一个重要课题，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鲁迅研究者攻伐钻研的重心之一。本文不揣浅陋，仅就以下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作若干探究：一是关于鲁迅杂文的渊源问题，因为鲁迅杂文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丰腴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沃土所养育的奇葩，诚如刘勰所揭示的：“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文心雕龙·通变》）。鲁迅正是渊博精深地汲取了古典文学的精英，然后熔铸锻冶、开拓新域，创立了杂文这一新文体；一是关于鲁迅在拓展中国现代杂文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元代诗人马祖常咏榴花诗云：“只待绿阴芳树合，蕊珠如火一时开”，移来比拟由鲁迅倡导与催发而芄然勃兴的杂文运动倒颇为帖切，不过所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杂文运动是如何在鲁迅的耕耘蒔刈下，才绽放得“红华绛采，炤烈泉石”，汇成一片无垠而炽烈的榴火的呢？

一 鲁迅杂文是对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有所承传、有所择取的结晶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文体的演变繁衍，代有嬗递。检视《文选》（萧统编）、《唐文粹》（姚铉编）、《宋文鉴》（吕祖谦编）、《元文类》（苏天爵编）、《明文衡》（程敏政编）、《国朝文录》（姚椿编）等断代的选本，大致可以窥见文体演化的轨迹，也可得窥某些赋有独创性的大作家在文体开创方面的开山作用。中国文学史的二十世纪篇章，必然要着力记录与论述鲁迅创造、促进、推广杂文这一新文体的不平凡的文学现象。

关于鲁迅杂文的独创性，师事鲁迅、相契弥深的冯雪峰有以下一段阐释：

鲁迅先生独创了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这尖锐的政论性的文艺形式。这是匕首，这是投枪，然而又是独特形式的诗！这形式，是鲁迅先生所独创的，是诗人和战士的一致产物。自然，这种形式，在中国旧文学里是有它的类似的存在，但我们知道旧文学中的这种形式，有的只是形式和笔法上有可取之点，精神上是完全不成的；有的则在精神上也有可取之点，却只是在那里自生自长的野草似的一点萌芽。鲁迅先生，以其战斗的需要，才独创了在其本身是非常完整的，而且由鲁迅先生自己达到了那高峰的独特的形式。①

冯雪峰进而认为，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列而毫无愧色的鲁

① 《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的文学道路》第27页。

迅杂文，不仅是“中国民族文学的奇花”，而且是“世界文学的奇花”，这也并非是过誉之辞。我们要探究的是，这璀灿的“奇花”，以何等新的因素丰实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呢？

首先，我们认为鲁迅所创造的杂文这一新文体，并不是天赋的神来之笔，更不是与海盗船俱来的舶来品，而是在丰厚的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所萌蘖滋长的花木；但是，又不是单纯的模仿与依傍，却是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

追溯一下鲁迅从事文学活动初期所接受的影响，将是不无意义的。青年鲁迅所最尊崇的启蒙导师是章太炎，在政治、哲学、文学诸方面都曾师承与追随。鲁迅后来曾称许章太炎为“提倡种族革命”的“活的纯正的先贤”（《花边文学·趋时与复古》），赞颂其当年不愧为“后生的楷范”，同时还追述了自己从仰慕到问学太炎先生的始末，说明自己青年时代师奉章太炎，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事实上，章太炎正是影响青年鲁迅世界观的确立以及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鲁迅其时在思想乃至文字上都接受了章的陶冶。

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尝熔中西学说于一炉而发为新义；其学养的渊博和思想的繁杂，在清季的革命先行者中也是仅见的。我们主要考察一下鲁迅问学章太炎前后，作为先哲及师长的这一启蒙思想家对于青年鲁迅此后文学道路的影响。

章太炎于一九〇七年在东京主持《民报》，积极鼓吹种族革命；鲁迅作为一个清国留学生，当时就“爱看”《民报》，为读章太炎抨击保皇派“所向披靡”的“战斗的文章”而“神旺”。正式听太炎先生讲学是在一九〇八年，据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回忆：“民元前四年（1908），我始偕朱蓬仙，……周豫才、启明昆仲，……前往受业。”同往受业的朱希祖在

《口授少年事迹》中回忆：“丁未，始与钱玄同、马幼渔、沈兼士、周豫才、周启明、许季黻等受业于本师，常至民报社，别在大成学校请本师讲授经学及音韵训诂之学，常至师寓请益。”又据北京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手稿，其中一九〇八年度有章太炎讲学记录，自四月四日起至十月底，除讲授《说文》、《尔雅》而外，还于八月五日至二十日插讲了《庄子》。

章太炎在对鲁迅等学生授业时，于诸子百家之中仅讲《庄子》是不无因由的。同年撰有《庄子解诂》，明年连载于《国粹学报》，在自志中写道：“余念《庄子》疑义甚众，会与诸生讲习旧文，即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亦或杂采诸家，音义大氏备矣。”可知是根据给鲁迅等授课的讲义整理为文的。当时章太炎对《庄子》非常推重：“若夫九流繁会，各于其党，命世哲人，莫若庄子”，甚至认为“以视孔墨，犹尘垢也”。一九一〇年又撰《齐物论释》，对这一阐发《庄子》的著作，章太炎也自视很高，于《自述学术次第》中认为是自己中年之后所作的“精要之言”，可谓“一字千金”，并说：“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类此极力推崇庄子的言论还在在可见，如《蓟汉微言》中说：“释迦应之，故出世之法多详于内圣，……孔老应之则世间之法多而详于外王，兼具二者，厥为庄生。齐物一篇，内以疏观万物，……外以治国保民”。甚至还与民族民主革命联系起来阐扬，如在《齐物论释》的《后序》中强调说：“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把它作为“博爱大同”思想的滥觞。综而言之，章太炎在日本鼓吹革命的这一历史时期，基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服务的目的，必须竭力破坏、贬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绵亘数千年的儒教形象，动摇孔丘的圣人地位，故而把庄周奉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典范，竭力崇扬《庄子》，授之以课，发而为文，鲁迅不能不受到强烈

的震撼与影响。

鲁迅从章太炎那里所受到的庄子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姑且略去不谈，侧重窥测一下在文学方面的浸淫与薰陶。

鲁迅后来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揭示了庄子“尤以文辞，陵轹诸子”的先秦散文代表作家的地位，盛赞其“文辞之美富”，并以感佩的口吻强调指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周作为中国先秦散文艺术造诣最高的大作家，创造了一种翱翔天宇，驰骋八方，纵横排宕，雄伟奇丽的新文体，鲁迅是十分倾倒的。庄子的文笔在历代的文学批评中常被评鹭为“汪洋恣肆”和“恢诡谲怪”，而这主要表现在意境的开阔和想象的丰富上。凡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天神地祇，飞禽走兽，鲲鹏雀鵙，鱼龙虾蟹，以及海市蜃楼之景，子虚乌有之境，都纷纷奔聚在庄子的笔端，倾泄于庄子的腕下，显现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其想象力的丰富、表现力的绚烂，在先秦诸子中是仅见的。清人钱树在《〈庄骚读本〉序》中说：“此犹春和夏舒之景，忽变而为严霜烈飙；平川广野之区，忽变而为洪涛峭壁。不如此不足以尽天地之大观而无憾也。”这段评语着重凸出了庄子文笔的腾挪跌宕、绚丽多姿，而这也正为鲁迅所取法。

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中说：“感觉着鲁迅颇受庄子的影响”，论据罗列了：“因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无论是顺是逆。”随之列举了若干例证，这当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命题的认识，然而关于鲁迅承继与借鉴庄子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则语焉不详，今试就以下方面蠡测一二：

关于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较早揭示的有何干之的“理论形象化”（《鲁迅思想研究》，1940年）、巴人的“思想之形

象性的记述形式”（《论鲁迅的杂文》，1940年），而这种议论的形象化，正是鲁迅杂文艺术感染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文心雕龙·神思》篇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中国古典文论早就揭示了作家的思想渗透于形象来表露的真谛，庄子正是借助于形象来阐述自己思想的能手，他胸襟开阔，想象无垠，既创造了击水三千里、扶摇九万里的大鹏形象，也创造了与之相对比的蜩、学鸠、斥鴳等渺小卑微的形象，其想象的奔驰，正如陆机的《文赋》所说的：“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鲁迅在胸襟气魄的廓大方面，由于时代、阶级的不同，应该说比庄子显得更为恢宏，他的杂文中许多具有典型性的形象描述，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例如，鲁迅把舍生取义、为民请命的忠义之士称为“中国的脊梁”，我看找不到更贴切、更生动的比拟了；而把那些蝇营狗苟之徒，数典忘祖之辈，洋奴西崽之流，正人君子之帮……，则比拟为“带铃铎的山羊”，“媚态的猫”，哼哼发议论的“蚊子”，以及“叭儿”之类。寥寥数笔，神形酷肖，勾魂摄魄，穷形极相，大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的气势与腕力。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庄子》的篇什，他也把与自己论战的宵小比拟为虫豸禽兽，例如把醉心功名利禄之徒比喻为专吃“腐鼠”的“鸱”，把苟且偷安、趋炎附势的人比喻为寄居于老母猪裆间胯下的“豕虱”等等。于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鲁迅杂文正是从《庄子》等文学遗产中得到借鉴，并推进了以鲜活生动的形象比附来臧否人物、鞭扑论敌的手法。

鲁迅曾称《楚辞》中的《天问》是中国神话的“渊薮”，那末，道家的《庄子》、《列子》等典籍似乎也可称为中国寓言的渊薮。《庄子》中引伸与创造了许多涵意深刻、譬喻生动的寓言，如“蛮触之争”（见《杂篇·则阳》）借各占蜗牛一角的蛮

触二国无休止攻战的寓言，以表示对于战国时期各国为了争城夺地、荼毒生灵的不义战争的厌恶；“庖丁解牛”（见《内篇·养生主》）借庖丁熟能生巧、游刃有余的故事，来说明业精于勤与掌握客观规律的重要；《痾痿承蜩》（见《外篇·达生》）借老丈捕蝉无往而不得的奇迹，来表达惟有专心壹志、锲而不舍才能达到自由境界的道理；类此的寓言在《庄子》中比比皆是，当然这些寓言都是为了阐释所谓“道”而发的。然而作为一种有力的艺术表现手段，鲁迅是珍视并借重的，他的杂文中所擅长运用的譬喻，包括隐喻、明喻、借喻以及拟人化手法，都是与中国古典寓言有血缘关系的承继与发展。鲁迅还把古代寓言称之为“大林深泉”，认为足可滋润后世的艺文。他曾捐资梓刻《百喻经》，后又为排印本的《痴华鬘》撰写《题记》，还介绍辑录有大量古代寓言的明徐元泰编纂的《喻林》，对于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鱼乐蝶梦、靡不具备的《庄子》中的寓言更是摩挲再三、运用自如，例如见于《庄子》的《内篇·大宗师》及《外篇·天运》的“涸辙之鲋”的寓言，就曾先后在杂文《我要骗人》、《〈译文〉复刊词》、致叶圣陶的信、《〈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的诗中都引用过，均是信手拈来，聊加点染而赋以新义，或象征友谊，或吟咏爱情，皆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既深入浅出，又感人至深，可见鲁迅对于庄子寓言的欣赏、娴熟与驱遣自如。《庄子》的《杂篇·寓言》中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目的无非在于“明经见道”；鲁迅杂文借寓言中所欲谕扬的“经”、“道”，当然赋予了新的时代的阶级的涵意，其崇高的境界是任何古人所不能企及的；而借助神话故事、寓言警句、历史掌故、故老传言等比拟手段来加强艺术感染力，这一中国古典散文表现手法的精义，鲁迅是深得此中三昧并在杂文中运用得十分得心应手的。

庄子的笔力雄健酣畅，无论状物写情都能声态并作，比起同时代那种质直、浅露、平正、艰涩的诸子文章富有更高的文学性，不仅长于抒情，而且善于讽刺。这种讽刺文字形同利刃，能把对象的特征刻划得惟妙惟肖，例如《杂篇·外物》中“儒以诗礼发冢”一节，盗墓的腐儒竟然假借《诗经》中：“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的章句，来作为盗取死人口中含珠的凭借。这种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入木三分的讽刺，把儒家道貌岸然的假面剥蚀已尽。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更锻冶到犀利无比的程度，总结了包括《庄子》在内的古典遗产中的诸如“婉而多讽”、“刻露而尽相”、“幽默而含讥”以及“并写两面，使之相形”等讽刺手法，而且廓大了所讽刺的社会相的容量与深度，甚至把讥刺的锋芒投向最高统治阶层乃至独夫民贼本身，或者代表黑暗的社会集团，以及觊觎中国的侵略势力，这些都是古典文学的讽刺所不能比肩的。

《庄子》具有“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的浪漫主义瑰伟奇丽的色彩，它以奔驰的想象，奇诡的意境，浩瀚的气势，魅人的形象，流丽的文笔，舒卷的格调，给予后世文学以深长的影响。鲁迅从问学章太炎起爱赏《庄子》以至终生不渝，主要在于它的“文采”，对于庄子所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虚无思想，鲁迅即使在早期也并不苟同、盲从，斥之为“毒”；晚年更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反对推荐《庄子》给青年阅读。但是也毋庸讳言，庄子汪洋恣肆、笔走龙蛇的文采，对鲁迅创造杂文这一新文体是有所裨益、有所借镜的；鲁迅杂文议论的形象性，可以说部分也得之于《庄子》的滋润。

上海图书馆藏有章太炎一九一三年所撰《自述学术次第》手稿，其第五节记有：“余少已好文辞，……三十四岁以后，欲以

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并强调说，“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查章太炎三十四岁为一九〇一年，正是他开始为革命奔走呼号之时，因为从实践中感受到清季盛行的“选学派”文章“局促如斯”，“桐城派”的文章又“务为曼衍”，都不适于作挥斥格斗的政论，于是感到“夫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对魏晋文章的推重，屡屡见于章的言论之中，直至一九二五年作《国学讲演纪录》，其中谈及“文学的派别”时认为魏晋时“文体大变，一改两汉壮美之气，而为优美风致之文，令人读之逸趣横生”。另在《国故论衡·论式》中更说：“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化入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章的得意门生黄侃作《国故论衡赞》也推崇其师“持论议礼，尊魏晋之笔”，这确乎为知音之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章太炎正是着眼于魏晋文章不拘于旧说，不囿于陈式，于是在中国古典文体的武库中选取了这一最宜于论辩，最擅于驳难，最长于攻战的文体——“魏晋之文”，从而写下了洋洋洒洒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史上所向披靡的文字，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序》等力作振聵作狮子吼，给当时的革命青年以剧烈的震撼。

鲁迅正是从所师奉的章太炎的“战斗的文章”中感受到了魏晋文章的格调与威力，又从章对魏晋文章的倡导中诱发了研习的志趣，这些都影响到鲁迅自己的文章风格，对后来杂文这一新文体的创立也有甚大的作用。当时，青年鲁迅一方面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的海涅、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那里获取精神力量，寻求“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伟美之音”，一方面则从民族文化遗产中发掘足以发扬踔厉，敢于与“温柔敦厚”的“诗

教”挑战，即所谓“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雄声”。而魏晋文学的代表作家如嵇康等所显露的“争天拒俗”的叛逆精神，必然会引起青年鲁迅的注目与共鸣。

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的因缘关系，从鲁迅对《嵇康集》的校勘来考察也可见端倪。从一九一三年起，曾先后七次校订《嵇康集》，并撰有《〈嵇康集〉序》、《〈嵇康集〉考》、《逸文考》、《著录考》等。鲁迅对于嵇康著作的辑逸、考订所耗费的精力，在他的古典作家研究中居于首位。鲁迅除赞赏嵇康的“非汤武，薄周孔”的胆识与魄力而外，也倾心他文章所赋有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与锋芒。鲁迅在《〈嵇康集〉考》中指出：“康文长于言理”，这是极中肯的评价。如《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公开与司马氏集团决裂的宣言，行文骈散相间，起伏有序，结构严密，浑然无隙。这种放言无惮地对窥伺篡位的司马氏的抨击，表露了嵇康鄙薄纲常礼教、功名利禄的强烈个性，而且文如其人地作了自由纵恣而复说理缜密的抒发与驳难，机锋犀利，挥斥劲遒。而这种新颖脱俗的文风正是为他的反传统反因循的思想内涵服务的，故而鲁迅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嵇康对当时统治者所崇奉的儒家的“诗书礼乐”作了勇猛的排击。除了许多“离经叛道”的言论而外，还有直接戟指最高统治者的“狂悖之言”，如在《太师箴》中无畏地写下：“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对“昔为天下，今为一身”的“居帝王者”进行了直接的斥责，这种不惧斧钺的嶙峋风骨，很为鲁迅所折服与神往。许寿裳曾回忆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嵇康的文章”，这是合乎事实的。鲁迅也曾注意到嵇康因为擅长论战，“藻艳盖非所措意”，不过康文的理胜辞弱、文

采稍逊也是相比较而论。稽康愤世嫉俗的孤傲品性必然影响到他文章的风格，既桀骜不驯，词意急切，也秀逸清奇，不同凡俗，《文心雕龙·明诗》篇云：“稽志清峻”，钟嵘《诗品》也说他“过于峻切”。看来鲁迅是同意这样的评析的，他自己在概括以稽康为代表的魏晋文章的特点时列有二条：一是“清峻的风格”，这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另一是“尚通脱”，也就是“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这种“清峻”、“通脱”的特点，与鲁迅剖析自己的思想“有时很峻急，有时又很随便”的状况，是有相通或近似之处的。鲁迅早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张扬我国优秀古典文学遗产中那种“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精神，也可以说是魏晋文学的特色；魏晋文学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特色，是与当时思想通脱，废除固执，以致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的时代风尚分不开的。而这样的时代风尚，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对西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魏晋玄学的兴起，形成了“儒墨之学见鄙”的现象，魏初荀粲甚至认为传世的六经不过是“圣人之糠粃”，对于禁锢思想的儒教的怀疑与否定，使文学解除了桎梏发展的精神枷锁，从而获得了空前繁盛。鲁迅在青年时代接受章太炎的熏陶与海导，对魏晋文学尤其是稽康诗文的倾心，绝非个人的爱赏，而是爱国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需要使然，是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的。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要战斗就必须择取适于论战的文体，而“康文长于言理”的特点正合乎所用。刘师培在《中古文学史》中也曾指出：“稽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认为“析理绵密，亦为汉人所未有”。这种说理透辟，不求藻饰，言之有物，矢矢中的的魏晋文章，与铺张扬厉的汉赋和浮嚣绮丽的六朝骈文迥然不同。章太炎为《民报》所撰的政论文，算得深谙魏晋文章“长于说理”的真谛，写得逻辑严密，老辣精炼，观点明